

第一冊

顧頡剛 劉起鈞 著

尚書校釋譯論

中華書局

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就是《尚書》。

它是我國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後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

在政治活動中所形成的一些語語、誓詞、談話紀錄等。

由史官執筆寫下，經歷了多災多難複雜曲折的流傳過程。

纔從當時眾多文獻中僥幸獲得保存下來的少數殘篇。

雖然在流傳中除西周極少數篇語詞外各書篇大都程度不等地受過後來文字的影響

但總之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夏、商、周政治活動中最早的歷史見證。

是研究這三代的唯一文字獻資料。

同時書中更保存了我國古代豐富的人文科學的和自然科學的各種重要資料。



尚書校釋譯論

顧頡剛 劉起鈞 著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尚書校釋譯論/顧頡剛,劉起鈞著. -北京:中華書局,2005

ISBN 7-101-02425-4

I. 尚… II. ①顧…②劉… III. 尚書-注釋
IV. K221.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2037 號

責任編輯:張忱石 汪聖鐸 王景桐

尚書校釋譯論

顧頡剛 劉起鈞 著

(全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0%印張·142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220.00 元

ISBN 7-101-02425-4/K·977

本書為“十五”國家出版規劃項目

華夏英才基金資助出版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出版



1975年10月與顧師攝於北京東城
乾麵胡同顧寓窗前，時正準備恢復整理
《尚書》



1996年春攝於北京勁松寓所書齋，
時正撰寫《堯典》校釋

北京勁松寓所書齋
1996年春攝於北京勁松寓所書齋
時正撰寫《堯典》校釋

最好先行高
 做如布法作
 中低，中低低
 做如低作初
 低如此列步
 时结实。惟为
 时间不不所
 致期先低中
 低，低初低
 基础。高低
 时律一二三第
 做出一个持
 本，保，心，
 此因
 出之一
 人之一
 者也。

尚

音高宗彫

目授

釋

(釋釋)

尚者为中国最古、最青，亦为同处最复杂、矛盾最行歧
 ；古籍。刊此古书，须分三部，其一为若集古今文字，加以
 批判，按安，注重考订工作，供于字、阅读及普及；根据
 是为高做型，极费时间而读者不多。其二为低型，简
 化、明、疏，就其源委，供大学文史诸生、阅读，是
 为中低型，本母是也。其三、更就中低型加以简化，但举
 校勘、符释、培采而不疏源委，供一般人之阅读，是为
 初低型，为我四十年前所译；程度全赖字为。高做
 型者名曰，为方译注；中低型者名曰，为方译注；初
 低型者名曰，为方译注。本母低中华方局判起舒
 同志后作，为字中低译物，礼例，原形为记。六二上月。

顧頔剛先生手迹

97.12.20-98.1.19 西安翻译学院
98.2.4-4.18 延安
4.20-4.30 延州

97.12.20-98.1.19 (在延安) 延安
98.1.20-2.3 延安
2.4-2.10 延安
2.11-2.18 延安
2.19-2.26 延安
2.27-3.5 延安
3.6-3.13 延安
3.14-3.21 延安
3.22-3.29 延安
3.30-4.6 延安
4.7-4.14 延安
4.15-4.22 延安
4.23-4.30 延安

鼻渊

《鼻渊》篇为先秦已存在的医书篇，先秦文献中经初步整理发现《素问》引用了次，为西汉张仲景《金匮要略》篇的第二篇，亦为增入林学《难经》之《难经》第二篇，西汉的《黄帝内经》中《素问》篇为《素问》第二篇，另有《素问》篇为第16篇。东汉马融《注本古文尚书》中，《鼻渊》篇为《素问》第二篇。《素问》篇次于《素问》。但林学注，列在《素问》24篇中。《素问》的古文，截取《素问》下章从《素问》来高次亦高次以下冒文《素问》篇中《素问》篇。于是《素问》及《素问》篇依次为《素问》篇中《素问》篇第4篇第5篇。今得仿古文分出的《素问》篇《素问》篇中，按高次在汉分古文《素问》篇中，其篇次为第2篇。其情况详复而订《素问》。使《素问》全篇编次《素问》篇为第2篇，以成文，只是编次了《素问》初的《素问》篇而已。故《素问》这几篇次都以现代语言译写，即所谓以训诂字代原文，这就使我们知道汉代对这些文白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推想这些篇章文句的原有意义。如《素问》在《素问》古文《素问》篇云：“《素问》篇，为《素问》篇与《素问》篇，鼻渊述其《素问》。”显然据汉代所传资料说明，此篇为鼻渊和

高起舒
改注

和共 93 页

《素问》篇在《素问》篇上的同篇之语。

劉起舒先生手迹

《尚書》爲先秦儒家兩部主要經典之一，起鈺弱冠承王先謙先生入室弟子先祖吟古公授讀，及長承恩師顧頡剛先生教導。謹積其所學，歷時三十餘年（1963—1999），備經交困以撰成此書。爲紀念師恩，特以與先師合著名義發表，以就正於方家。

序 言

我在 1989 年 6 月出版的拙著《尚書學史》書前的“小引”中說：

“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就是《尚書》。它是我國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後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統治者在政治活動中所形成的一些誥語、誓詞、談話紀錄等，由史臣載筆寫下，經歷了多災多難複雜曲折的流傳過程，才從當時衆多文獻中僥幸獲得保存下來的少數幾篇。雖然在流傳中除西周極少幾篇誥詞外各書篇大都程度不等地受過後來文字的影響，但總之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夏、商、周政治活動中最早的歷史見證，是研究這三代的 firsthand 文獻資料，同時書中更保存了我國古代豐富的人文科學的和自然科學的各種重要資料。”——這是該“小引”的第一段，說明了《尚書》本身原來的實質情況。它只是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並保存了珍貴的古代科學資料。不過被孔子彙編作為儒家兩部重要課本之一的歷史課本，教授門徒。

“到了漢代，它却被尊奉為儒家‘五經’中最重要的一經，其間出現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傳》、《周禮》一起（後來還加上其它一些經）引起了學術史上長期的今古文之爭。到東晉又出現了偽古文，糾葛更多。然不論發生些什麼變故，它總是隨着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歷史發展，始終雄踞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寶座

上，成了歷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讀必遵的政治與道德教科書，給了漢以後全部封建時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響。”——這是該“小引”的第二段，說明原來的一部歷史文獻，漢代起被奉為儒家教義的神聖經典，作為政治道德教科書的權威，指導着紛亂的封建時代，從而構建了整個封建時代的統治思想，還由它孕育了完整的封建史學體系。

“現在所見到的《尚書》，它的形成過程很複雜，它的篇章內容很晦澀，它的經歷情況也很繁亂，在作為中國學術史中心的經學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因此這麼一部書的本身情況及它在漫長的歷史中所有的遭遇和其發展演變大要，就成了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這是該“小引”的第三段，說明了今所見《尚書》這本書，經歷了複雜繁亂的情況。由上二項合此共三項，構成了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有待加以鑽研解決。”

由上面三段“小引”文中看到了有關《尚書》的全面情況。知道它原只是一部單純的史籍，可是後來既被作為中國學術史中心的經學史上的一個重鎮，更是備受困厄處於葛藤叢棘的中國最古一部史籍，甚需要恢復其真實面目。在該“小引”的結語中說：“現在把這麼一部曾作為經典的重要史籍，根據它的歷史演進情況，尋其變遷遞嬗之迹……用以作一綜覽前後的闡述，作為一部粗糙的《尚書學史稿》提出。”復在《尚書學史》後面的“簡短的跋語”中說：“現在，……這部粗具規模的《尚書學史》，作為《尚書校釋譯論》一書的姊妹篇先行向學術界提出。”

原來現在出版的這部篇幅較大共達一百五十多萬字的《尚書校釋譯論》，却是那部篇幅較小的四十餘萬字的《尚書學史》的姊妹篇。二者相輔相成，作為《尚書》之學的兩翼，希望能以之稍盡綿力，

共同把《尚書》之學推向前進。《尚書學史》以《尚書》一書所經多災多難迷離撲朔的經歷及圍繞它在歷代所發生的政治的、思想的、學術的各種糾葛爲其研究對象，從而以求了解有關《尚書》的各種來龍去脈及其成爲這麼一部書的遞嬗經過之迹的真相。《尚書校釋譯論》則以保存在《古文尚書》中的漢代今文二十八篇的內容爲其研究對象。凡兩千多年來有關《尚書》的文字糾葛、內容紛歧、經說爭執，以及以今日眼光所能探知其資料來源、神話原貌與其人爲的歷史化，從而出現的錯誤認識，對歷史的錯誤理解，對資料的錯誤使用，舉凡可以探得其真諦者力求探得之。把這部有名佶屈聱牙難於讀通的書，儘量求取粗通其意。真正難通之處，也展明其資料原貌，供學者繼續研究。以這種謹慎態度對待，使這作爲姊妹篇的兩部《尚書》著作，各在其本身領域內力求較踏實地寫成。

這兩部書的寫成，完全是源於吾師顧頡剛先生一生研究《尚書》，提出他的“《尚書》十種”計劃中所欲力求完成的數種。於1962年冬由中宣部把我從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處調來北京，協助顧先生完成他這一科學地整理《尚書》的宏願，就是在他的指導下，秉其整理《尚書》的意圖與規劃，來承乏整理《尚書》全書之責。我日夜竭盡綿薄，備經困厄，而後始獲先後寫成的。

在“文革”後期曾聽國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長在一次報告中說，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尚書》整理翻譯出來，否則讀不懂，不好利用。”這句話顧先生在當時是不知道的，不像前此請顧先生負《資治通鑑》“總校”之責，是明白奉毛主席之命；後來負點校二十四史“總其成”之責，是明白奉周總理之命。此時則只是顧先生1962年在廣東從化休養地，遇周揚同志也在，相與談到《尚書》工作，顧先生以自己體力已衰，推薦在大學時曾從他治《尚書》的我來協助他，周揚同志把

我的名字帶回中宣部，在一次會議上決定調我來京了。當時把我安排在中華書局任《尚書》研究專職，據顧先生告訴我，當時他和歷史所領導的關係搞不好，而中華書局領導金燦然同志熱情支持此工作，故做此安排。我幼承原為王先謙先生及門弟子的祖父用心教讀傳統典籍（其中《左傳》曾命我每年點讀一遍），至十六歲先祖父棄世時已粗諳古典學術門徑，粗具傳統文學根底。大學畢業後，陰錯陽差搞了十幾年現代史料工作，到這時我已四十五歲，正精力旺盛，以為好不容易回到我素所嗜好的古典學術途徑上來，獲得展布其所學的機會，這是多年夢寐以求的事，又得中華書局給以良好的環境與條件，因此恆心適意地全力投入工作。

按，顧師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主要是從《尚書》研究得來的。1922年因對《尚書》和《詩經》、《論語》的比較研究，得出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這一有名學說。其後在南北各地大學都相繼開了《尚書》研究課。發現《尚書》內容涉及到全部古史，特別是儒家構建古帝先王體系，設計理想的政治制度，樹立道統中心，及《尚書》成為儒家五經中最尊的一經，成為牢籠百代的統治思想，都是運用《尚書》來造成的。因此以為要有效地從這四方面來清算古史，就必須用力攻破《尚書》這一堡壘。於是他此後孜孜汲汲地從事《尚書》研究，就按此構想進行。1928年提出對《尚書》中可信的今文二十八篇的看法和考辨計劃。1936年編成《尚書通檢》。在其序文中提出研究《尚書》的總的打算，一是把《尚書》經文各種字體的本子集為一編，見其變遷沿誤；二是輯出唐以前各書引用過的逸《書》；三是搜集歷代學者討論《尚書》之文，尋出若干結論；四是研究《尚書》用字造句的文法，並與甲骨文、金文比較。以為要把這四項做好，“最後才下手去作《尚書》全書的考定”。這些是顧師較早

期對《尚書》研究的幾次通盤打算，其總的脈絡、總的歸趣及總的前後步伐，在以後的《尚書》研究中，基本按此做。只是補充了些具體項目，或作了較詳的規劃。也就由於長期忙於《尚書》的各項具體研究，因而就如《尚書通檢·序》所說的，一直未去做“最後才下手去作”的“《尚書》全書的考定”。

解放後，顧師 1954 年在上海寫的《法華讀書記》(一)中提出整理《尚書》擬作“《尚書》十種”。數月後在《法華讀書記》(二)中再度提此十書計劃，兩次計劃有九種相同(惟先後順序略異)，而各有一不同。現在合錄其九種相同的如下：(1)《尚書文字合編》，(2)《尚書通檢》，(3)《尚書校文》，(4)《尚書集釋》，(5)《尚書今譯》，(6)《尚書學史》，(7)《尚書學書目》，(8)《僞古文尚書集證》，(9)《尚書學論文選》。其二者各不同的一種，今亦依次列為：(10)《尚書簡注》，(11)《金文選》。其後還多次提出過類似計劃，大抵同此，只有詳略多少的微異，或者側重點稍不同。這也可說是顧先生夙寐以求完成的《尚書》研究的十大項目了。

1954 年，顧先生奉周總理之命調北京入歷史研究所，首先是任毛主席交辦的點校《資治通鑑》的總校。接着輔導蘇聯訪華學者越特金研究《史記》。而後自己點校《史記》三家注本，至 1958 年完成。這段時期無力顧及《尚書》。1959 年始奉命整理《尚書》，見其《讀尚書筆記》(一)、(五)、(六)三者的“前記”中都記明“奉整理《尚書》之命”。不過其(一)的所記又記明“顧予老矣，百骸都虧，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勢已有所不可……因書其力不從心之苦於此”。當時科學院有每年夏送研究人員至青島休假的美政。這一年夏顧先生至青島休假，適逢我也自南京來此休假，師生愉快相見，談到奉命整理《尚書》，即以上述《筆記》所言之意，要我赴京相助，我自然

表示樂意。如上所述，至1962年顧先生請於周揚同志，經中宣部批准，乃調我成功。

顧師自己於1959年起恢復整理《尚書》，考慮應該做《尚書通檢·序》中所說的“最後才下手去作《尚書》全部的考定”的工作，就決定整理今文二十八篇。並決定先整理最難讀的又是周代歷史最重要的《大誥》篇。1962年寫出初稿，以篇幅過大，就擇要寫成《尚書大誥今譯（摘要）》發表於《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全文分校勘、解釋、章句、今譯、考證五個部分。這是對《尚書》按篇進行校釋整理的試作，也作為研究整理《尚書》的樣板，學術界極予重視。《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李平心文，盛譽此文優點有五，最後以為全面、系統地弄清《尚書》各篇的歷史背景與脈絡，可以說是對《尚書》進行總結性的整理，提出了別具一格的著作體例。

我來整理《尚書》即依此篇體例進行。但我先要對《尚書》作歷史的了解，掌握這部書所有有關資料，自然要涉及整個經學有關文獻的資料，先花了半年時間每天覓資料於北京市內所有圖書館、舊書店（當時北京市內舊書店還很多），搜集群經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情況，用卡片把它記下來，歸而取自宋明以迄現在各種書目及文獻著錄相對勘（自然還要稽之於漢、隋兩藝文經籍之志），撰成《尚書及群經版本錄》；又取中華書局圖書館所藏有關歷代石經圖書、圖錄、拓片等資料及北京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等處有關石經圖書等各項資料，撰成《歷代石經》；最後據顧先生所藏和中華書局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及所能複製隸古定寫本原照片、影印本、縮微膠卷本與有關著錄、記載，撰寫《尚書隸古定古寫本》。這三種都是從來沒有過的全面地系統地力求做到巨細無遺的總書目（這三種後來又經我於1989年訪日四個月及1992再訪日兩個多月

詳加蒐尋補充了不少彼土資料，使之更臻完善)。有了這三種，就可全面詳細占有有關《尚書》與群經的資料情況了。

然後就依據顧師《尚書大誥今譯(摘要)》體例，開始撰寫各篇，先擇夏商幾篇中最短的撰寫，記得寫了《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將其中《高宗彤日》篇油印，邀請當時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專家二十餘人座談，請提意見。他們提出將顧先生文章五部分中的“章句”部分併入“解釋”部分。我採納他們的意見，定我撰寫之文為“校勘、解釋、今譯、考證”四部分，徵得了顧師同意。

“文化大革命”一起，我所撰寫各篇全毀，唯幸《高宗彤日》有油印本，其版本、石經、隸古定諸篇有原始卡片或原始稿，“文革”後得據以恢復。

“文革”既過，塵埃落定，顧先生於1975年託白壽彝先生請於胡繩同志，調我歸歷史所，我於1976年到所。好容易以六十之年獲得坐下來讀書研究的機會，得以復我《尚書》故業，以為是平生大幸，力求較好完成任務，用以仰副中宣部及胡繩同志委用之重，亦以不負老師付託之殷，兼以克盡自己所膺學術史上之重責。所幸我體力尚佳，精力尚盛，用能孜孜汲汲，日夜不懈，全力以赴，自1976年至1999年凡二十餘年，寫出四百五十餘萬字，百餘篇論文，八九部拙著。其中關於《尚書》者五部，而主要的是於今年完成的這部顧師找我來京叫我撰寫的主體著作《尚書校釋譯論》(即顧師《尚書通檢·序》中所說最後才下手作的“《尚書》全部的考定”一書)。

關於此書的撰寫，於1976年恢復《尚書》工作後即重新開始。原準備按《尚書》各篇依次寫下去，而且開始寫了第一篇《堯典》的前面一部分。顧師見了，以為《堯典》、《禹貢》為巨篇，會占時間多，不如先寫後面諸篇。因此我就壓下《堯典》，但在其整理過程中，幾

經研析，以為應該將原改定的“校勘、解釋、今譯、考證”四部分，再省併為“校釋、今譯、討論”三部分，並定書名為《尚書校釋譯論》，各單篇發表亦稱“校釋譯論”。取得顧師同意後，即先將顧師《大誥》篇按此三部分改寫，然後就寫《禹貢》之後的《甘誓》篇，由此以下各篇即按原篇順序依次寫下去。至1980年顧師不幸棄世之日，在其關注下已寫成了《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諸篇，其中經顧師審閱並以顧師與起鈺合名發表者，有《甘誓》（《中國史研究》第1期，1979年3月）、《湯誓》（《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1月）、《盤庚》（《歷史學》創刊號，1979年3月；第2期，1979年6月）、《西伯勘黎》（《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輯，1980年6月）、《微子》（《社會科學戰綫》，1981年2月）等五篇。

顧師以1980年12月病逝，我們陷入哀悼中，1981年起即無暇及於《尚書》，首先是助白壽彝師在報上寫哀悼之文，而後應各方刊物之請寫顧先生小傳或某方面學術成就之文。計迄1982年止，為《中國歷史學年鑑（1982年）》、《光明日報》社編《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國歷史文獻研究室”編《中國史學家傳》，各就不同要求不同側重或長稿或小篇寫成，而《社會科學戰綫》則約寫《顧頡剛先生與〈尚書〉研究》（《新華文摘》1984年12月轉載）。而當我經歷了這些後於1983年恢復《尚書》工作後，復歷年都有約寫顧師傳記者，如《國際著名史學家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歷代地理學家評傳》的《作為地理學家的顧頡剛先生》，《文史哲·紀念顧先生專號》的《顧先生卓越的尚書研究》等，在各方紛紛需要了解顧師學術的情況下，因而我勉力應時寫了《顧頡剛先生學述》一書，由中華書局於1986年出版，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顧